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哲学认识的发展史，是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交织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对立统一中的斗争史。中国哲学由于其经济的、社会的和地理的等多种原因，具有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当前，学习中国哲学史，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哲学史是世界哲学史的一部分。要了解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必须先了解哲学史的对象。顾名思义，哲学史是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萌芽、产生和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哲学既然是一门学问，当然，它和其他具体科学一样，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不过它只是认识史的一部分，因为其他具体科学史同样也是人类认识史的一部分。

在人类对世界进行哲学认识时，必然首先要回答物质和意识（亦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全部哲学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基础。它贯穿于全部哲学问题之中，决定或影响着对其他哲学问题的解决。因此，恩格斯称这个问题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重大的基本问题”。不同的哲学家，由于受其阶级利益和自然科学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识等因素的制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和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认为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物质决定意识。有的认为意识在先，物质在后，意识决定物质。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回答不同，哲学家就自然分为对立的两派。凡主张物质决定意识者，就组成唯物主义派别；凡主张意识决定物质者，就组成唯心主义派别。这样，哲学史就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当然，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并非每个人对哲学基本问题在主观上都那么明确，也并非每个人都使用“物质”、“意识”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中心问题表现为天与人、本与末、有与无、理与气、道与器等关系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就其实质来说，无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即以“天人之辩”来说，那种主张“天”是有意志并能主宰“人”的人格神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主张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因为超自然的“天”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人们头脑中产生的一种观念。

同时，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不是说历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都是纯粹的。事实上，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里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里也不可能一点唯物主义因素都没有。有的哲学家可能在此问题上唯物的，而在彼问题上却是唯心的；有的则相反。有的哲学家可能在前期是唯物的，而后期转向唯心，有的则相反。但是却没有一个在哲学基本问题面前，既不唯物，又非唯心的哲学家。即使哲学史上的二元论或者口头上宣称自己“超越”于唯物和唯心之上的哲学家，只要将其思想加以剖析，仍然不难发现，其思想终归还是隶属于某一哲学阵营。由此可见，哲学史是人类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但是，这还不是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全部。因为思维与存在的

关系问题虽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回答这个问题还只是说明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并没有说明世界的状态是怎样的，即世界是否运动；变化和发展。围绕这个问题，哲学家展开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个问题无疑也是哲学认识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总是和前一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并影响和制约着对前一个问题的认识，同时也贯穿于哲学认识的终始。因而它无疑也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可以对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作如下概括：哲学史是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斗争史。

明确了一般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也就不难明白了：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哲学认识的发展史，是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斗争史。

第二节 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和特点

哲学认识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入的发展过程。其间充满反复和曲折。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列宁将之喻为认识史上的“圆圈”。中国哲学史也是如此。在本书所讲到的中国古代及近代哲学思想里，根据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及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先秦时期。中国哲学产生于奴隶社会，初期的哲学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的束缚。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巨大变革，开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众多的学派对哲学的各方面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孕育了以后二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学术思潮和学派的萌芽和胚胎。从哲学认识的发展过程

看，经历了从商周时期的原始“阴阳”、“五行”说的朴素唯物主义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家的天命论和道家的道论的唯心主义，再到战国末期的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构成了认识发展史的第一个“圆圈”。

（二）汉唐时期。伴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伴随国内各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哲学开始向纵深发展。五彩缤纷的学派由先秦时期的胚胎逐步发展、成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两汉经学）、道（玄学、道教）和佛教相继活跃于思想舞台，三教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从而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大发展。为尔后的中国哲学向更高级阶段的迈进奠定了基础。从哲学认识的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从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到玄学和佛学唯心主义，再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元气一元论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构成了认识发展史的第二个“圆圈”。

（三）宋明和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时期。伴随我国封建制后期专制制度的巩固与加强，以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儒道佛三教逐渐融合为宋明理学。理学内部众多学派通过相互斗争和相互汲取，极大地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发展。这是中国哲学的金色之秋，哲学园地结满了丰硕的果实。它对丰富人类理论思维的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哲学认识的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从张载的唯物主义气本体论到程朱陆王的理学唯心主义，再到王夫之等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构成了认识发展史的第三个“圆圈”。

（四）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伴随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巨变，中国哲学揭开了新篇章。传统哲学不足以指导救国救民的斗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引进了近代西方哲学。他们融贯中西，会通古今，构筑了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并掀起了中国近代声

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旧思想的激战，同时也为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中国近代哲学属于资产阶级哲学范畴。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它的体系还不十分完备。但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远远高于以往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传统哲学。在哲学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由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尚变”、“重行”思想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夸大“心力”作用的唯心主义，再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唯物主义的“知难行易”说，体现了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发展进程。

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它遵循全人类哲学认识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普遍规律，诸如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党性原则、哲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化核心的哲学，在不同的国家，又必然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其深厚的民族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和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东亚大陆，以西北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大陆民族（有别于希腊、罗马、英国等濒临大海的海洋民族），数千年来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有别于近代欧美的工业社会），与此相联系，社会制度长期以来是一种宗法制度，政治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有别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民主制和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了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的特点。

（一）哲学与伦理、政治思想的密切联系。哲学本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总结与概括，但是不同民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进行这种总结和概括时，往往有所侧重。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则侧重于科学和思维。

中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号称“礼义之邦”，这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为道德型文化，而有别于西方的科学型文化，也势必促使中国哲学同伦理思想密切相联。在西方，“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爱智。这种哲学以探求宇宙观、认识论为中心，而同道德论相区分，以认识和征服自然为目的，即使探求道德论，也是为认识和征服自然服务。通过学哲学，能够使人变得聪明。在中国，“哲学”一词的意思是成圣。它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以认识社会人生为目的，即使探求宇宙观和认识论，也往往给宇宙和认识赋予道德的属性。在中国哲学看来，什么是“天”（宇宙）？“天”即“命”“人”、“理”、“心”、“性”。什么是“知”？“知”即“良知”、“心”。什么是“行”？“行”即孝亲、应事、接物等道德践履。什么是“学”？“学”即读圣贤经书如“四书”、“五经”之类。什么是“做学问”？做学问就是“尽心、养心、求放心”，就是“寡欲”。由此可见。这种宇宙观和认识论，不过是为促进人们的道德修养服务。学习哲学的意义在于使人成圣贤。既然“成贤”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所追求的目的，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科学与技术便为中国哲人不屑一顾了，那些不过是雕虫小技。孔子斥责“学稼”者为“小人”，朱熹斥醉心于自然界一草一木的学问为“炊沙而欲其成饭”，十足反映了中国的先哲对自然科学的蔑视。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远科学近伦理的特点。

中国哲学除了与伦理紧密相联之外，还同社会政治紧密相联。这也是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本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哲学，在古今中外的私有制社会里，都必然要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相联系，绝对超然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西方，这种联系往往要通过很多的中间环节，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哲学往往是一种纯思辩纯理论的形式。中国则不同，建立在高

度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都要求哲学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哲学家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服务的统治阶级提供“治世之道”。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哲学史籍里，我们很难找到一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纯哲学著作；在众多的中国哲学家中，很少有不兼任政治活动家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之学，都与各自依附的阶级、阶层的政治主张直接相联。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其哲学思想无不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们都是“有为”的实践家。即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仍然是以“无为”为手段去实现“无不为”的社会政治目的。两汉经学之所以成为官方哲学，显然是因为它毫不掩饰地为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代之而起的魏晋玄学，尽管口头上标榜远离现实，然而它所有的虚玄高论，无一不与门阀士族的政治需求相关联。隋唐时期的佛教，其教义虽然同封建政治存在矛盾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它那消极的出世主义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却又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从而得到唐朝皇帝的大力扶植。宋明理学由于从理论的高度论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天经地义，所以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更是紧密相联，无论哪一个学术思潮，都是为解决救国救民的政治任务提供哲学依据的。纵观中国哲学史，无论哪一个时期的哪一种哲学思潮和派别，无一不对社会政治生活保持着一种巨大的向心力。

（二）中国哲学的无神论传统。在长达一千年之久的欧洲中世纪，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宗教，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分支和婢女。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农业社会，铸定了中华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虽有种种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却不存在政教合一，基本上没有出现全民族的宗教

狂热。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始终是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而不是相反。对于王权来说，尽管它需要宗教神学来麻痹人民的意志，需要用“神道设教”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它更需要哲学从理论上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在中国历史上，自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这也使得宗教神学不可能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在历史上，儒与佛、道尽管号称“三教”，但是“儒教”之“教”，意指“教化”，并非宗教。儒家向来主张“入世”，积极干预现实生活，反对宗教的“出世”和逃避现实生活。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终其一生，“不语怪力乱神”。他关注的是人事，而不是鬼神；是生前，而不是死后；是教化，而不是宗教。他重视理性，对中国哲学史的无神论传统具有深远影响。西汉董仲舒虽极力将儒学神学化，提出了神学目的论，但这种理论却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是积极的“入世”，而不是消极的“出世”。宋明理学尽管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资料，主张“禁欲主义”，对人们起着宗教一样的作用，但它却根本上不是宗教，相反还以宗教的反对者自居。隋唐佛教虽然盛行一时，但却始终不能动摇儒学的正统地位，倒是不断在自己的理论中引进儒家的思想。正是由于中国哲学史具有从不间断的无神论传统，因而当欧洲中世纪陷入黑暗愚昧和哲学贫困之际，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三）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传统。当中国先哲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人生领域时，中国历史上永无止境的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的治乱分合，风云激荡的农民战争，层出不穷的民族纠纷，捉摸不定的人生沉浮等等历史现象，必然会给人的思想以强烈刺激，使人感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变易发展，生生不已的世界，各种事物和现象既相互联结、和谐一致，又矛盾重重。从而产生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先秦的《周易》、《老子》一直到明清之际

的王夫之，再到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代代相传，继往开来，形成了一个从不间断的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它明显地区别于欧洲。在那里，古希腊罗马虽然也产生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可是接下来却是基督教统治造成的千年左右的哲学贫困，加之以近代由于自然科学发展初期的特殊状况造成的形而上学，直到19世纪，辩证法才重登哲学舞台。因而它不具有连续不断的辩证法思想的传统。

第三节 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意义

学习历史不是把历史当作古董来鉴赏，而是为了古为今用。那么，学习中国哲学史对于今天有些什么意义呢？

一、有利于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目前全国人民的宏伟目标。而任何现代化建设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能不认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全部文化莫不受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影响。因此，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能不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是封建时代的文化，它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相形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全部过时了，毫无现实意义了。应该看到，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都必然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一种是民主的、科学的、进步的、革命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文化；一种是反民主的、反科学的、落后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文化。

前一种文化是精华，后一种文化是糟粕。任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能也不可能割断同自己传统文化的联系。问题只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及哲学同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并深入到民族骨髓的传统文化，要想轻易抛弃，实行“全盘西化”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反之，对于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实行全盘继承，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有悖于历史的发展规律。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然后取其精华，加以批判地继承，促进现代化建设；弃其糟粕，肃清阻碍现代化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它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是中国人民千百年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晶，是全人类理论思维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中国哲学，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学习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精华，并用之于实践，必然会产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如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也存在着糟粕部分，即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理论。它们连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是属于封建主义的，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有碍于现代化建设。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时间的仓促等原因，未能对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深入批判，因此，直到今天，它仍然像幽灵一样，依傍着人们。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封建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宣传或推行，极大地阻碍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仍然是当前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要肃清它，首先就需要认识它、了解它。因此，通过学习中国哲学史，认识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建设。

二、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是被历史实践证明唯一能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世界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马列主义的故乡在西方，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历史规律表明，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和文化，要在一个民族扎根，变为该民族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成为该民族的行动指南，就必须同该民族的实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直至相融合，否则就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佛教诞生于印度，对中国来说，是外来宗教，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汉至唐，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先是与方术相结合，继之以玄学化，最后援儒入佛，从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马列主义及其哲学在我国扎根，同样需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他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赋予中国传统哲学新的含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今天的中国，才这样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学习中国哲学史是非常必要的。

三、有助于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

哲学包括哲学史历来被认为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针对一些科学家忽视理论思维的倾向时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近代自然科学之所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465页。

以需要理论思维，这是因为它积累了大量实证的知识材料。对这些材料只有通过理论思维进行分析与综合，总结和概括，才能发现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在这里，只用经验的方法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往往陷入歧途。当前，科学技术正经历一场新的革命，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更加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

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之所以需要学习以往的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哲学思维就是一种理论思维。哲学史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人类在以往的哲学认识过程中，并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并不是时刻都是正确的，其间充满着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由不深刻到深刻的发展过程。这里既有经验，也有教训。通过学习哲学史，深入研究前人进行理论思维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必然能发展和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并进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思考题

1.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是什么？
2. 中国哲学有些什么特点？
3. 学习中国哲学有何意义？

参考书目

《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3—47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63、399页。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历史悠久。它萌芽于原始社会，产生于奴隶制的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哲学是伴随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初步发展，以及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深受中国奴隶制的特点的影响，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它和宗教神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神学唯心主义是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商周之际，随着社会的发展，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也产生了，这就是原始的阴阳五行学说。同时，反神学的无神论思想也随着奴隶制的动摇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

第一节 概 述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朝，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就产生了，迄今已有 4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作为中国哲学的萌芽，还可以往上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

我国大约在 100 万年前进入人类社会，初期的人类称为原始人。在劳动的推动下，使类人猿进化为人。在劳动中实现了手足分工、猿脑变为人脑、产生意识和认识能力。

人脑产生之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便开始了，同时，人类的哲学思想也随之萌芽。自从出现了人类便产生了人类和周围客观事物的关系问题，亦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类周围的

客观事物，如飞禽走兽、草木水火等是否脱离人而独立存在？人类能否利用这些事物帮助自己生存？这些问题原始人通过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实际上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人若没有野果兽肉鱼虾等食物便不能充饥的生活体验，使原始人认识到野果兽肉鱼虾等食物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实在；人若没有水便不能解渴的生活体验，使原始人认识到水也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实在。在北京人生活过的山洞里发现的火烧过的灰烬、兽骨和石头，足以说明原始人已经认识到火的作用并能使用天然火。后世流传的关于远古时期的“钻燧取火”的传说，说明原始人已经认识到“钻燧”与火之间的关系，说明他们已经懂得人是可以支配自然的。古代文献上记载的所谓盘古开天劈地、女娲炼石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均可视为原始人幻想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表现。上述种种事例表明，在原始人的思想意识里，人类周围的各种自然物都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实在。这种从人们生活中得来的认识，当然只是一种朴素的认识，我们称之为朴素实在意识。但这种朴素实在意识实际上就是哲学思想的萌芽，具体说来，是人类史前时期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上述朴素的实在思想意识仅是原始人思想意识的一个方面。原始人的思想意识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原始的宗教观念。不难想像，人类之初，生产力的水平是十分低下的，与此同时，原始人自身又缺乏理论思维能力，仿佛一个人尚处在婴儿时期。因此，必然导致原始宗教有神观念的产生。这种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万物有灵论。由于原始人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在强大的自然力量诸如风雨雷电、洪水猛兽面前，感到软弱无力。他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常常被外界的自然物吞噬或战败。众多的自然物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对原始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在各种自然物

的背后一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驱使他们。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原始人认为，那一定是和人的身体内部存在的思想即“灵魂”一样的东西，各种自然物的内部也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这种灵魂就是一种有人格的神。这种观念就是万物有灵的观念。

其次是灵魂不灭的观念。原始人对于人自身的构造、人的精神活动以及人的死亡等问题也不能理解，对于梦这种生理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在他们看来，人似乎由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结合而成，人的精神是一种既可以寄居于人体又可以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人活着时，灵魂便寄居于人体之内；人死之后，灵魂便离开人体而移居他处。灵魂和人体这种可分可合的关系可用梦的现象得到证实：梦中出现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梦醒之后，灵魂则又回到肉体之中。既然人死之后灵魂可以离开人体继续活着，因而，就没有理由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灵魂不灭的观念便产生了。

再次是图腾崇拜。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因而个人必须依赖集体即氏族或部落的力量才能生存，任何个人如果离开了氏族，便不能生存下去。这样，就产生了对氏族及其祖先的崇拜。与此同时，处于原始采集和渔猎时期的人们，由于经常依靠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植物或矿物生活，离开了这些动植物同样也不能生存。这样，在原始人思想里又出现了对这些自然物的崇拜即图腾崇拜。这种对氏族祖先的崇拜和对某些自然物的崇拜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原始人看来，某些与本氏族的生存有着密切联系的动植物就是自己氏族的祖先，本氏族就是这些动植物的后代。于是，他们就以这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象征或标志。这种动植物就是氏族图腾。仰韶彩陶上的鸟、鱼、蛙、虫等图案，实际上均是这种图腾崇拜观念的表现。

以上种种原始宗教观念同样涉及到人和外部世界即思维与存

在的关系问题，因此，也是原始社会哲学思想萌芽的一种表现。由于这种观念歪曲了二者的关系，所以，具体说来，它是原始社会唯心主义思想的萌芽。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朴素的实在思想和原始宗教观念都只是哲学思想的萌芽，还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本来意义上的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诉诸于文字，它只能产生于阶级社会。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以后，中经商朝到西周，奴隶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直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开始衰落。

我国的奴隶制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它实行土地国有制，即土地和劳动者（奴隶）都属于奴隶主国家所有，其具体形式为井田制。《诗经》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就是这种所有制的写照。这种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它是由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直接演变过来的，因此，中国的奴隶制称之为氏族奴隶制或种族奴隶制。相对古希腊罗马说来，它不是一种成熟的奴隶制。

与上述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的奴隶社会，特别是西周时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奴隶主贵族最高统治者天子将除国都附近之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同性及异性亲属和功臣等诸侯，各建邦国。在各诸侯国之内，亦实行分封制，即诸侯将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把其土地分封给士，由士直接统治着。奴隶制国家通过一系列礼仪制度将社会上自天子下至各级贵族士庶百姓以及劳动人民的尊卑等级界限明确规定下来，形成宝塔式的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从天子到诸侯以及各级官吏实行父死嫡长子继承的世卿世禄制度。通过以上各项政治制度及各种刑罚，实现奴隶主对奴隶

的统治。

在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残酷的，奴隶反抗奴隶主的统治也是十分激烈的。奴隶主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一方面需要强化国家机器即暴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从思想意识上为其统治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和论证。夏商西周时期哲学思想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除此之外，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社会分工的进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较原始社会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夏朝开始出现青铜器，《越绝书》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近年来在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用青铜铸造的爵、铃、刀、镞、铙等器具。到了商代，青铜业较之夏代有了飞跃发展，仅在殷墟一地出土的青铜礼器就达数千件之多，制作技术也大大提高。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历史结束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在夏代的经济领域里，除了畜牧业外，农业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到了商代，进一步扩大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中水利技术已有一定的发展，对土地的整治和施肥也很重视，农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商业已有了初步发展，出现了专业商人和以海贝、玉贝、铜贝为商业交换媒介的货币。社会经济的发展表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远远超过原始社会。

在社会生产的推动下，这时期的科学文化也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文字的发明。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刻划文字，经科学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初期。而目前保存最多的则是商代的甲骨文，其单字总数约有3500字左右。文字是由社会上专职的脑力劳动者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而创造的，它和青铜器一样，也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天文学产生了。夏